

历史可以很生动

——《那年 那人：重庆1949—2024》



历史照片所吸引。书中文章，一共配了230幅照片，让我顿时有“以图说史”如临其境的亲切感。这些照片，有的还原了刘邓大军进军重庆和入城的场景；有的定格了人民大礼堂工地上正在搭建的拱顶；有的留住了已经拆除的两路口宽银幕电影院。这些都是重庆人茶余饭后心心念念的老话题。跨度长达75年的这些照片，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，几乎都是黑白照片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彩色照片就逐渐多起来，直到后来变成清一色的彩色照片。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算是给75年发展史的一个小小的注脚。

要从75年中遴选出代表重庆精神、重庆气象的75个人、75件事，来反映重庆的历史变迁，这是很考验编者眼光的。从1949年的“进军大西南”，到2024年的“民主村社区”爆火，《那年》的编者从75年的众多大事件中，选出一百零一年特别具有话题性的代表性事件，让事件的亲历者带着自己独有的感受讲述给读者，这样，日渐远去的历史就有了温度和温度。

这些事件，汇聚了重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第一：1952年贯通的由中国自行修建并建成的第一条铁路——

成渝铁路；1955年开园的重庆第一座大型主题公园——重庆动物园；1956年建成的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——大田湾体育场；1960年落成的中国第一座专门为放映宽银幕电影而修建的电影院——山城宽银幕电影院；1961年出版的当时发行量第一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《红岩》；1966年出厂的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车“红岩CQ260”；1969年通车的亚洲第一座悬索桥——北碚嘉陵江朝阳桥；1983年投产的中国第一家天然气化工化纤联合企业——四川维尼纶厂；1987年通车的“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”——长江索道；1989年川剧演员沈铁梅为重庆夺得第一个中国戏剧梅花奖；1991年天津成为中国第一个“双拥模范县”……通过这一个“第一”，我们可以看到重庆向前迈进的一个个坚实脚印。

《那年》一书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且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。1949年12月8日，西南服务团举行入城仪式，团员们清晨5点就兴奋地集合，上午10点仪式开始，团员们紧随野战部队入城。1952年5月1日，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视察文化宫施工工地，时任重庆市市长曹荻秋邀请他为文化宫题写馆名。邓小

平反复书写，从36个字中挑选出自己最满意的10个字。解放碑碑顶上的时钟最初是机械大钟，需要守钟人每天进入碑中，爬到碑顶，为大钟校时间、上发条，为此还专门为守钟人配了进口手表和自行车。黄桷坪发电厂的两塔烟囱均有240米高，是当年亚洲最高的烟囱和重庆最高的建筑物。如今，提档升级的发电厂搬迁出主城区，这两座标志性的工业建筑已经成为火热的文旅打卡点。1957年发掘的“合川马门溪龙”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恐龙化石，技术人员在进行修复和装架展陈时，因为头骨缺失，就为这具骨架装了一个仿梁龙的头骨模型。1995年，在四川自贡发掘出与合川马门溪龙形态相同、大小接近的恐龙骨架，这一具骨架带有头骨，技术人员这才确定合川马门溪龙“装错了头”，于是给展陈的标本换上了正确的头骨模型……

《那年》一书中，有很多这样有历史价值同时又生动有趣的细节，可以看出，编著人员充分考虑了让这部反映75年历史变迁的大著既权威，又生动可读。让读者通过一本书感受重庆75年的跨越式发展，就让草率通过一滴露珠中太阳的反光感受春天的来临，《那年》这本书做到了。

吴向阳

一座城市的历史该如何表达？岁月沧桑，纸上华章，笔墨和影像自然是极好的表现形式。

重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那年 那人：重庆1949—2024》（以下简称《那年》）选择用小故事来代替宏大叙事，用小细节来丰富大场面，为读者还原一个有烟火气、有市井味的城市史。75年的栉风沐雨、风雨前行，用75部皇皇巨著也难以全景展现；编著者另辟蹊径，从1949年开始，每年选取一件事，通过以事找人、以人说事，用身边人、身边事来回顾75年来重庆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，以近似于口述史的方式向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城市致敬。

翻开《那年》，首先被大量的



周勇

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、灿烂文化、优秀人文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、人文荟萃、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。在三峡大坝的山水之间，大山的脉动与大江的潮涌相互激荡，自然的壮美与创造的瑰丽交相辉映，城镇的繁华与乡村的宁静相得益彰，展现出江山之城的恢宏气势，绽放出美美与共的璀璨风采。

在3000多年的发展史上，重庆出现过多层次、多领域、多形态的文化现象，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巴渝文化、革命文化、三峡文化、抗战文化、统战文化、移民文化。它们是最具代表性和符号意义的文化元素，由此构成了独具特色的重庆历史文化体系。其中，巴渝文化、革命文化彼此相连，贯通始终，传承演化，



王立军

有一朵绚烂绽放的云朵，悠然自得地掠过山巅，随风轻扬，直至天际的尽头。在这段旅程中，我们渐渐领悟到，生命中的某些离别，悄然成为了永恒的诀别。这段文字源于小说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，它出自别具一格的作家张嘉佳之手。

该书以云边镇为背景，细腻描绘了主角刘十三与外婆王莺莺之间深厚的祖孙情，以及他与身患重病的少女程霜之间温馨而短暂的陪伴。随着刘十三的成长，他经历了职场的挫败与爱情的波折，最终选择回归云边镇，在这片故土上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与成长的力量。对我而言，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宛如一股清泉，一处隐藏的珍宝，一盏指引方向的明灯。此次阅读之旅，我仿佛与刘十三并肩同行，共同踏上了一场关于寻找与自我救赎的心灵探索。

童年的纯真，构成了故事的开篇篇章，宛如一则未经雕琢的

北碚：一个凤凰涅槃般的传奇地方

共同构成今日重庆历史文化体系的学理基石，也是形成今日重庆人文精神以及重庆人、重庆城性格特征的文化基因。三峡文化、移民文化、抗战文化、统战文化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中，于重庆大地上产生的特色文化。在漫漫历史长河的不同阶段中，发挥着独特的作用，至今仍仍是重庆历史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因素，发挥着核心竞争力的作用。

北碚，地处缙云山麓、嘉陵江畔，是一个产生过凤凰涅槃般传说的地方。

100多年前，北碚还只是一个山川美丽，但匪患肆虐的小乡场。到80多年前的全面抗战时期，北碚已发展成为一座享誉中国的美丽小城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北碚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今的北碚，已经是重庆主城区都市区的中心城区之一。北碚的百年发展史展现出极具时代特征的突发性、内涵式发展的特质。北碚素来生态环境优良、人民安居乐业，科学教育发达、创新活力迸发，产业发展兴盛、工业基础雄厚，尤以历史渊源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而著称。这在重庆历史文化体系

中具有综合性、典型性、代表性。

在建设重庆文化强市的比拼中，北碚人用满满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，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北碚，以文化的视野宏观鸟瞰北碚，以艺术的手段通俗表现北碚，从史话、名人、抗战、乡建、教育、科技、诗文、书画、民俗、景观十个方面，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北碚的文化和历史，构成了图文并茂、鲜活生动的北碚文化画卷。这部十卷本的“北碚文化丛书”，就是北碚人书写北碚传奇的代表作，更是向时代和人民交出的一份厚重的文化答卷。

“北碚文化丛书”具有广泛的包容性。它涵盖了历史沿革、文化遗产、民俗风情、民间艺术、人文景观、贤达名流、文学艺术、教育科技等方面，既有地域文化的基本要素，更彰显了北碚在抗战、乡建、教育、科技等方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突出地位。北碚的百年发展史，以学术研究为依托，史料基础可靠，学术名家参与，表达通俗易懂，集系统性、知识性、可读性于一体，有存史资政的收藏价值和指导旅游观光的实用价值。

“北碚文化丛书”是校地合作的有益尝试，既是对北碚地方

文化的一次学术性清理，在史料整理、学术研究方面展现出全面、系统的特征，也为基层地域科学地挖掘整理在地文化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。

这些年来，我着力于重庆历史文化体系的研究，组织编撰了十二卷本的“重庆人文丛书”，而这套十卷本的“北碚文化丛书”，是继“重庆人文丛书”之后，重庆主城区内出版的第一部区县文化丛书。我相信，这部饱含着浓浓乡情，充满了城市记忆，洋溢着北碚味道的文字和画面的丛书，将使北碚的历史文化得以活在当下，让北碚的历史文脉传承延续，绵绵不绝。

同时我也希望各区县都能像北碚这样虔诚地敬重自己的历史文化，努力地整理自己的历史文化，用皇皇巨著来传承自己的历史文化，尤其是从重庆市委提出的重庆文化新体系中找准自己的文化新定位，让生动的区域文化，共同汇聚成彰显重庆文化新体系的花园，建设具有中国气象、巴渝特色、万紫千红的山清水秀美丽之地。

（本文系《北碚文化丛书》总序，有删改。）

寻找生活的微光

——读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有感



明对比。城市的灯光虽亮，却缺乏那份源自心底的温暖；而乡下的日光虽淡，却饱含温情，照亮人心。

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，人们往往被竞争和速度推着走，失去了自我。但在云边镇，这里没有固定的方向，没有必须遵守的规则，一切都随心所欲，淡然美好。这里，让人们找回了那份久违的宁静与自由，也找到了坚定生活的微光。

（作者为重庆三峡学院学生）



电子书
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

近悦远来书香重庆

书评投稿邮箱：cqrbdsb@163.com

写在茅奖边上 ④8

【作品简介】

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江南三部曲》（2011—2014），是作家格非创作的长篇小说，包括《人面桃花》《山河入梦》《春尽江南》三部作品。格非的《江南三部曲》以对历史和现实郑重负责的态度，深切注视着现代中国的壮阔历程。以百年的跨度，在革命史与精神史的映照中，处理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性命题。三代人的上下求索，交织着解放的渴望和梦想的激情，在兴衰成败与悲欢离合之间。



题记：江南残梦，历史宿命；精神重建，个人实现。

单士兵

能不忆江南？何处是江南？

这样的感怀与追寻，之所以长久地交织于无数人心中，那是因为，江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，而是一种历史记忆，是一种文化概念，是一种心理意象，是一种价值判断。江南秩序，江南文化，江南气质，江南腔调……这一切，都让人觉得，理想的乌托邦、梦中的桃花源，最适合在江南安放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，江南和桃源梦，是具象和抽象的互文。

只是，梦醒时分，遇见真江南之后，又总会面对太多的灰暗与浮躁，让人不经意间就从诗意跌落到失意。

文学里的江南，往往要比现实世界更加开阔，更有纵深，更为精密。读懂江南，可以从魏晋六朝以来浪漫婉约的诗词中寻迹，也可以从明清两代性灵的小品文中透视。当然，越过古典来到现代，以跟着的地理印象也越清晰，可以跟着俞平伯去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，随着苏童去逛那条暗影斑驳的香椿树街，沿着叶兆言写的江南旧事去打捞历史的老物件。

不过，要祛除笼罩在“江南”这个文化概念上的迷雾，则需要跳出这些自然景观和物质器具，以更加开放的全球视野来审视江南的时代性格。对此，格非的《江南三部曲》无疑提供了更好的镜鉴。

“江南三部曲”分三部，即《人面桃花》《山河入梦》《春尽江南》。格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酝酿构思，随后，潜心沉潜，精耕细作，于2004年出版《人面桃花》，2007年出版《山河入梦》，2011年出版《春尽江南》。2012年4月，历时十几年，完整的“江南三部曲”终于面世。这三部作品，各自独立成书，人物和地理又有着一定的线索连接，由此，历史命运形成了一个完整性的文化思考闭环。

格非是个学者型作家，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，既有灵思飞扬的情才，又有系统深刻的思想。显然，面对“江南三部曲”这样蕴藏着深厚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作品，要成为其理想读者，就必须跨越一定的文化思想门槛。

当下文学评论有两种声响，一种是学院派在玩弄晦涩难懂的概念符号，不加节制地贡献华丽辞藻；一种是所谓民间独立批评者极尽刻薄之能事，抛开文本、结构、思想的系统性分析，简单围绕那些具有感官刺激性的描写进行讽刺谩骂。特别是个别人自以为是的野生文艺评论家，以“骂遍”名家的方式招摇过市，博得薄名，其实就是在制造文化戾气。比如，有人就专挑名家作品中的性描写，对包括莫言、贾平凹、乔叶等人极尽嘲讽。这一点，格非和他的“江南三部曲”也同样难逃厄运。这种文化心胸格局，窄了，小了。

“江南三部曲”能以票数第一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，本质上还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值得信赖的艺术价值。近几届茅奖评选实行打平制，给这项文学评奖赋予了较为厚实的“民主评议”特质。从整体获奖作品的质量基本来看，几乎不再出现前几届那种吊诡的评选结果了。诸如《都市风流》《骚动之秋》等后来几乎不再被读者记忆的茅奖作品，如今追溯到评奖环节，都能找到一些踩踏“程序正义”的人为干预。而随着评奖机制的日趋完善，随着文艺价值次序选择更具共识性，对待茅奖这种代表着国家最高文学荣誉的作品，读者当然需要摒弃浮躁、心怀敬畏，这本身也是应有的文化自觉。

独立批判是高贵的品质，但把刻意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，甚至是恶毒攻击也说是文学批评，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悲剧了。格非能把文学叙事和哲学思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，对“江南”的精神内涵和现实秩序进行更有体系性和逻辑性的思考，这样的文艺价值，当然不应被轻慢与漠视。

语言是作家的脸面，也是气质。凡是一流的小说家，首先应该是个语言学家。在茅奖作家中，作品的高度虽然不能完全与文笔划上等号，但好作品在文本与艺术上，一定都在某个高位达到平衡。莫言、迟子建、宗璞、陈忠实、苏童、毕飞宇、格非、徐则臣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，莫不如此。经过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写作实践的格非，

在怀念江南的时候应该怀念什么

其语言风格是古典的，是诗性的，是有书卷气的，是充满意象的，是有抒情性的，是有音乐节奏感的。当然，格非语言也无处不在地充满哲思性。这样的小说，是留白的，是耐读的，是有带入感的。格非就是在用充满美感神韵的文本，养护他笔下的“江南气质”。

“江南三部曲”书写的是在“大历史”的转折点，个人在实现生命价值时遭遇的困境，来引导人们关于世界观、历史观、生命观、生活观的深刻思考。从人物关系角度看，“江南三部曲”写了一个家庭近百年的“秘史”；从故事地点看，“普济”“梅城”“花家舍”等江南地理的安放地，被格非用来作为江南的象征。从时间内容看，《人面桃花》主要写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，知识人群的人间桃花源情结，以及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探索追求；《山河入梦》集中在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权力阶层开启的那场具有“乌托邦”式色彩的社会实践；《春尽江南》则是聚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社会发展，来透析现代人的精神困境。

江南三部曲，百年沉浮梦。《人面桃花》展示的是一个恍惚迷离的江南，《山河入梦》揭示的是一个疯狂失序的江南，《春尽江南》描写的是一个颓废绝望的江南。这样的江南诗意消亡历程，无疑正是在沿袭着江南士人精神为代表的“道统”溃败、江南士人精神沦陷的文化脉络，最终将历史浓缩于一个家族的百年命运变化，来铺陈一部古典诗意江南的现代颓败凋零史，让人们听到一曲关于文化江南生命消解的挽歌。

在《人面桃花》中，无论是陆侃为建设世界桃源的梦想发疯，还是土匪头子王观澄建成人间桃花源的突兀，抑或是张季元、陆秀米等中国第一代革命者建设理想社会的幻灭，都清晰表明那个时代的江南情结，只剩下了执念或私心。在《山河入梦》中，郭从

年建立的花家舍，具有乌托邦式的美好表象，但这里的“大同世界”实质是专制集权的威权来完成的。“花家舍人民公社”看似人人平等，其实人人自危，除了强权不受监督，普通人只能处于无孔不入的监视之中。试图废除制度弊端、县长平功达，最终也只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而作为“江南三部曲”的终结篇，《春尽江南》展示的是现代欲望社会的秩序紊乱和人性迷失，主人公庞家玉从单纯的诗歌爱好者转身为逐利的律师，甚至在解决自身房产纠纷时还选择动用“黑社会”力量，在欲望包裹之中逐渐背离了良心与爱心。人性、文明、法治的沦丧，让江南再无春日，让精神家园走向荒芜。

花家舍，是三部作品中都写到的地点。在《人面桃花》中，花家舍是桃源图、桃源梦的实验田，是追求大同世界的理想主义者的集散地，是超越身份鸿沟有着共同生活愿景者的灵魂栖息地。那样的花家舍，只是活在古典残梦之中；到了《山河入梦》里面，在大历史的风浪冲击下，这样的“江南遗梦”渐渐被惊醒了，刺破了，清洗了，制度变革的冲击力瞬间荡涤掉传统的人性伦理；最终在《春尽江南》里，花家舍在利益驱动下，陷入疯狂开发的物质洪流中，曾经的传统江南变成了一个表象繁华的灯红酒绿地带。至此，当年陆侃想把各家各户连接在一起的风雨长廊，经历了近百年的岁月烟云后，也彻底失去作为文明价值观的纽带价值，只能充当花家舍吸引游客的逐利工具。古典的文化——陆秀米、姚佩佩、庞家玉，在默然中香消玉殒，缓缓走向历史的尽头。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……能不忆江南”，真正的好江南，一定不只是好风景。“何处是江南”，这样的无奈慨叹，更不会只是因为江南春色难觅的遗憾，而是对历史、社会、生命等社会哲学问题的现实求解，陷入了长久的困境。桃花源和乌托邦，都只是南柯一梦。真正的美好社会，依然未能成为被所有人都清晰看见的现实图景。在“大历史”的转折年代风雨中，如何实现个人价值，需要呈现更为理性的时代答卷。

人面桃花，历史残梦；山河入梦，不见自我；春尽江南，失落落魄。在谈论江南的时候，人们不应该只是在谈论风景；在怀念江南的时候，人们都应该在想要怀念什么。